



长视频和短视频阵营的纠纷，从纸面“撕”到了台面，使“行规”建立成为不容回避的课题——

当谈视频时大家在争什么

文化观察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多年后中国网络视频行业“行规”明确竞争有序大格局形成时，人们一定会想起几天刚刚举行的第九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谁也没想到，一场供业内交流、分享真知灼见的行业盛会，一开场就成为各视频巨头“针尖对麦芒”的口水大战，长视频和短视频阵营的积怨，瞬间从纸面“撕”到了台面。长视频之争“撕破脸”的态势，使“行规”建立成为亟不可待的课题。

优酷、爱奇艺和腾讯都成了“难兄难弟”

自优酷总裁樊路远上台后，这场行业峰会的画风陡然一转。在此之前，华数、芒果超媒和B站的负责人依次上台发言。哔哩哔哩董事长兼CEO陈睿还分享了B站一组漂亮的数据，“B站月均活跃UP主数量达220万，日均视频投稿量达770万，其中超90%是原创和自制的内容”。“B站的日均视频播放量达到16亿次，用户日均使用时长达到82分钟”……

“他们前面三位讲得好，活得好。从我这开始，就是难兄难弟的发言了。”原本一直在内容版权上争个头破血流的优酷、爱奇艺和腾讯三家，如今却成了樊路远口中的“难兄难弟”。

他直言，变化就在最近三年。三年前不管在哪里都会是焦点的优酷、爱奇艺、腾讯，现在风光不再。“以市值论，B站的市值，几乎相当于优酷的三家之和，打个七折还要多，我们三家影响力很小了。”

在论战中，优酷将矛头指向了短视频阵营中的B站，“希望B站能一直把原创的短视频当成自己的主要发展目标。”并呼吁视频行业“像打击酒驾一样打击侵权，共同建立短视频先授权后使用的规则。”

接着樊路远的话茬，爱奇艺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龚宇详细地阐述了两种短视频侵权行为。第一种是硬盗版，把长视频的内容直接拿来用，但这种情况现在比较少见，因为各大平台有相关的反盗版系统；第二种是软盗版，比如几分钟解说一部电影——“二创是什么，是用没授权的东西，加上自己的东西，掩盖盗版的本质。”

比起前两位，腾讯副总裁孙忠怀言辞更为激烈。他还贡献了“猪食论”一说，语出惊人，直接登上微博热搜，引发刷屏讨论。“短视频个性化分发太厉害，你喜欢猪食，看到的就全是猪食。”在他看来，短视频是非常反智的低俗的娱乐消费品，迅速把一代人的审美品位拉下了去，这些内容的广泛传播消耗了用户的大量时间。

一番刀光剑影，目标在谁，不言自明。在场的快手联合创始人杨泽熙听完此话后，并未给出正面回应，只是说“接在优酷腾讯三位老总后面，接受了热情洋溢的指导”。而

且自辩“大家对短视频行业有点误解”。

一场隔空的对话，使舆论迅速发酵。另一家短视频巨头坐不住了，字节跳动副总裁李亮直接在微博头条上发文，驳斥孙忠怀的“猪食论”。并列举了腾讯的“罪状”：“号称已经拥有数亿用户的微信视频号，是目前唯一一家没有按要求上线‘未成年模式’的短视频平台”。腾讯自己大力发展短视频的同时，一直在攻击短视频行业”。

如果说以上仅仅停留在高管的口角之争，第二天字节跳动的正式回应则将事件引到另一个方向。6月4日，字节跳动在官方微博发布《字节跳动遭遇腾讯屏蔽和封禁大事记（2018-2021）》，并附上了一份洋洋洒洒52页的文件，历数三年来字节系多个产品“被腾讯屏蔽和封禁”的过程。

据《大事记》显示，腾讯以各种方式屏蔽、封禁、污名化短视频同行，对字节跳动旗下抖音、火山小视频、西瓜视频封禁持续三年，波及用户总量超10亿。直到现在，由于微信的封禁，每天仍有超过4900万人次主动分享抖音至微信/QQ时受阻。

这篇公众号文章，目前已被删除。但其出手的凶狠，可说是长短视频平台“有你无我”式矛盾最清楚的表现。

给长短视频争执一个公允评估

长视频对短视频的声讨，其实是“久已矣，非一日矣”。

早先的4月9日，优爱腾与芒果TV、咪咕视频联合15家影视行业协会、53家影视公司发表联合声明，将对网络上针对影视作品内容未经授权进行剪辑、切条、搬运、传播等行为，发起集中、必要的法律维权行动。4月23日，阵营扩大为17家影视行业协会、54家影视公司以及近五百位演职人员。

前不久，就有一次围绕经典美剧《老友记》的风波。5月27日下午，《老友记重聚特辑》在爱奇艺、腾讯、优酷三家平台上线后，仅数小时，B站就出现了完整片段及大量剪辑后的切片视频。第二天，三家平台同时发布声明予以谴责，逼迫B站迅速下架了相关视频。

从之前的联合声明，到公开谴责，而今进化到以“猪食”相讥，一招紧似一招苦相逼，正说明了长视频的日子确实不好过。正像樊路远所说，“我们三家什么时候能盈利？如果是现在的这种生存环境下，‘指日可待’简直是痴心妄想。”

爱奇艺2021年一季度财报显示，总营收实现超预期增长，达到79.68亿元，但业绩仍未摆脱持续亏损状态，一季度净亏损仍达12.57亿元。其余两家亏损情况未见公布，但可以猜想情况不会乐观。

而6月2日新鲜出炉的《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对此作了印证：截至2020年12月，短视频领域市场规模达到了2051.3亿元；其次才是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代表的综合视频领域，市场规模为1190.3亿元。这仿佛在宣告，长视频平台距离盈利的那天更远了。

因此，长视频平台的声讨，某种程度上被解读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迁怒于人。曾起诉爱奇艺“超前点播”的法律人士吴声威就此评论，“开始用猪食这种描述，无非是失败者的无奈和呻吟，因为不管是用法律、还是拍桌子，注定都是在走下坡路。”

但真实情况却并不如此简单。深入分析长视频平台的弱势，无法回避传播方式的先天短板，但也有“被剥夺与被损害”的一面，只有对此有更清楚的界定，才真正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首先看，撇开情急下的狠话，长视频对短视频在软盗版上的指责，并非胡搅蛮缠：“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在长视频播出的平台之外，分段式的盗版短视频播出总时长和长视频播出的时长已经基本是同一个量级的了，然而付出的成本可能相差10倍甚至20倍。”龚宇这样算帐。显然，对于长视频平台来说，短视频侵权已经造成了不容小视的利益损失。

但长视频把自身窘境全部归咎于短视频，甚至出现了“猪食说”，则确实也有用力过猛之嫌。短视频较之于长视频，对用户注意力要求更低、娱乐性更强等优势，注定了其在传播上占尽优势，比长视频无疑更香。这是长视频只能不甘不如的。龚宇在抨击短视频二次制作时“90分钟一场足球比赛的价值就集中在那一分钟多钟，如果全网铺天盖地都是足球射门的视频，那谁还买90分钟的足球比赛？”的精彩比喻，实际上也清楚地说明了长视频的弱势所在。

短视频侵权不对，但优势却并非全部来自于侵权——这也许是对当下长短视频争执的一个公允评估。

引导双方平台在内容创作上见高低

厘清这一前提点，我们才能对长短视频争执如何解决作一个清晰判断。

对于长视频平台而言，寻求更切实的盈利模式固然是长久之策，但当下最急需的，是对其版权的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视频巨头的集体炮轰，是为了求生存而不得不祭出的“逼宫”。

正如樊路远在大会上所说的，“如何能让网络视听产业走得更稳健、更长远，就看对侵权的规则制定。”具体说，是基于著作权法对“二

次创作”短视频中何者构成合理使用进行恰当判断，为公众通过短视频这种媒介形态进行表达和作品创作的自由提供合理的制度支持。

有了版权的界定，才能保证长视频以自身的制作优势来对冲短视频传播上的长项，找回生存发展的空间。否则，长视频在传播方式天然劣势的情况下再坐视制作方面长项被随意宰割，确实没有活路可走。

但同时，版权的界定，并不是单纯保护长视频。对于短视频，撇开一时利害考量，其实也是长期利好。

这是因为，由于底层逻辑的不同，长视频和短视频的内容高低上，虽然不尽如“猪食说”那样极端，但确实容易形成分野：相对来说，长视频更具高度，短视频更注重通俗，这就如同“白领”“蓝领”的形式之别来源于内在性质不同是一样道理。因此，任何一家寻找更大发展空间的平台，都会谋求长视频短视频的互相渗透。长中有短、短中有长，是必然趋势。

事实上，不管是优爱腾，还是快抖B（快手、抖音、B站），都已经陆续开始了长视频+短视频的打法：长视频平台在孵化自己的内容创作社区，比如2020年爱奇艺上线的短视频平台随刻，就对标YouTube，打造自己的二创平台。短视频也是这样，即使是风头当前无两的抖音，也意识到在上游链的薄弱，开始在内容端上发力。

这也就决定了，不管是长视频，还是短视频，风物长宜放眼量，下一步的发展，都需建立牢靠的护城河，都得依靠优质的自制内容。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早界定好平台权利，努力淡化长短视频在传播方式的差异与优劣，而引导双方平台在内容创作上见高低。倘若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多年后回首，才能意识到这次大佬们争执的意义是多么重大。

说古论今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上海文学》的“作家讲坛”专栏，在今年5月号中刊出著名评论家许子东的文章《史铁生〈插队的故事〉——最杰出的知青小说》。许子东给予《插队的故事》如此之高的嘉许，是因为“有一些知青小说更加有名，但艺术上可能不如《插队的故事》；也有艺术上同样精湛的小说，但已不再是典型的知青文学。所以史铁生的《插队的故事》是最杰出的知青小说，没有之一”。

许子东认为，《插队的故事》与其他知青文学的区别，首先在于“清醒抒情，坦然面对历史”；另一个区别，“就是史铁生既写知青的境遇感受，又花了更多的笔墨描写农民的生活、心态”。

知青文学写作方面有许多名家，包括梁晓声、韩少功、阿城等。许子东认为，这些作家主要都在写知青，“但史铁生不是。小说里有不少可以独立成章的农民故事，比之前的农村题材小说还要具体真实。”

具体真实到什么程度呢？许子东说：“小说中的知青讲起胡娃、随随这些农民家的事情，就像自己的事情一样。”

例如，《插队的故事》中娓娓叙述：在“我”住的窑洞旁边，有个农民叫“疤子”，儿子叫明娃。“疤子那年三十七岁，看上去像有五十。疤子是不大会发愁的人，或者也会，只是旁人看不出。他生来好像只为做两件事，一是受苦，一是抽烟，两件事都做得愉快。疤子婆姨三十五岁，已经有七个儿子。除去明娃，个个都活蹦蹦的，结实着哩。冬天的早晨，雪刚停，五元儿、六元儿站在窑前撒尿，光着屁股在雪地里跳，在雪地里嚷，在雪地上尿出一排排小洞。晚上，一条炕上睡一个排，一个比一个短一截，横盖一条被。这时候明娃妈就坐到炕里去，开始纺线或者织布。油灯又跳又摇，冒着黑烟。疤子或者一心抽烟，或者边抽烟边响起鼾声。”

寥寥数笔，几个人物形象、家庭生活场景，勾勒得生动鲜活，跃然纸上。看后也能了解，那时候陕北农村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仅仅是原生态地描写农村和农民，史铁生的小说也不会成为许子东口中的“最杰出”。《插队的故事》还具有“清醒抒情”的突出特点。许子东评价说，梁晓声讴歌“北大荒”：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张承志咏叹“北方的河”想念“绿色的夜”，一往情深；“可是史铁生的抒情小说，却从不激动，十分节制清醒。”

史铁生的人生经历颇为坎坷。突如其来的病魔袭击，让他不得不坐在轮椅上写作和思考，这极大地改变了他的生活，也不能不影响到他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他对生活的观察多了一些冷静，多了一些维度，思考也更复杂深刻。这些有分量的内容，积累沉淀到写作中，经过思想进一步净化和升华，再加上他舍而不露又入木三分的叙事功底，让作品“充满诗意又极其现实”。

这大约也是很多人喜欢史铁生作品的原因，有生活的真实又有艺术的真实，看似平淡却蕴含人生百味，在生活的“真”与文学的“美”之间，妙合无垠，意味深长。

这是顶级高手的功夫。如果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没有深厚的生活积累，没有独到的深入思考，是望尘莫及的。如郑板桥之论画竹，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个层次，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无眼中之竹的积累，何来渗透着独特审美情趣的胸中之竹？无高超的画竹功夫，又如何把胸中之竹纤毫不差地点染成手中之竹？

这些方面出类拔萃的佳作不少。由此想到了一部老电影《一九四二》。作为一部商业片，这部电影不算成功，票房一般；但从艺术上看，又确实值得称道。电影在再现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尤其演员们的表演可圈可点，所以最终还是斩获了多项大奖。

电影以1942年河南遇到大旱灾情为背景，当时千百万民众沦为灾民，生计无着，外出逃难。演好这个时代的这些人物，对演员来说，面临诸多挑战。为了更真实地了解，为了更贴近人物，更像灾民，主演张国立等需要减肥。开拍前，他们少吃一顿饭，而且还只能吃一根黄瓜、两个西红柿，加一顿青菜汤。又一段时间下来，张国立已经是形销骨立，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冯小刚这才认可，认为他找到了人物的感觉。拍摄期间，有一次因为实在饿了，体力不支，张国立差点晕过去，冯小刚赶紧从兜里掏出一颗巧克力，张国立吃下去，慢慢缓过劲来。旁边也是一身逃难装扮的徐帆，看得泪花点点。张国立以为徐帆是担心自己，赶紧安慰她。想不到徐帆说：“我也饿，我也想吃。”

有生活，有演技，还要有付出，有牺牲，这才成就了这部作品的独一无二。

像《插队的故事》（一九四二）一样，优秀的作品，无论文学还是艺术方面，其特点和成长过程都是相似的。一部作品，如果没有生活，缺乏生活的逻辑，表达不出生活的本质，讲故事的手段又很拙劣，还想着赚口碑、挣钱，那确实是想多了！

生活加诗意，好作品应有的样子

“六安”读音之辨

如河水一般流淌的“音”

漫谈

□ 周学洋

不久前，在央视《新闻联播》一则报道中，主持人郭志坚将“六安”读作“六(lù)安”。很快便有网友指出郭志坚的读法错误，“六安”应该读作“六(lù)安”。

郭志坚回应说播音员以《新华字典》为据，而《新华字典》上六只有lù的读音；不少学者纷纷加入讨论，有学者主张应该尊重“六(lù)安”的古音读法，有学者进一步考证表示，“六(lù)安”也不是六安的古音读法，当地人将“六”读作lu的，是国际音标喉塞音符号，意即江淮方言里，“六”的读音是lù加喉塞音韵尾。

这场读音之辨，争论了一个月。在这场争论中，我比较欣赏北京大学语言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刘祥柏的态度。刘祥柏本身是六安人，他说：“六安”的“六”读“lu”，非当地方言，也非古音发音，而是普通话的一个文读音，对读“lu”安，还是“lù”安，自己没有任何倾向性。

“没有任何倾向性”，其实是追求“达意”则已，这是顺应语音客观变迁的科学态度。同一个字，因为地域不同而表现为读音不

同，这对于面积广大的中国来说，实在不算是稀罕事，也是语言发展中的常见现象。

语言学中最复杂的便是读音的变迁。语音是发展变化的，古人没有录音设备，一个字的古音到底怎么读，今人已经很难琢磨。但在语音变化的历史长河中，有些称谓会比较固定。按照上海大学语言学教授余志鸿所言：语音中最不容易发生变化的是人的身体部位和器官名称，其次便是地名和人名，这些不容易发生变化的字词“音”，会成为残存的“古音活化石”。

地名的多音是常见现象。我初到上海读大学时，老师便说，你们山东有个费(fei)县，古代叫费(bi)县。f音叫作轻唇音，而古代没有轻唇音。“古无轻唇音”是由清代历史学家、汉学家钱大昕首先提出的第一条汉语声母演变规律，是指三十六字母中的“非敷奉微”这组音在上古是不存在的，这组音在上古读作“帮滂并明”，轻唇音是在唐宋初时期从“帮滂并明”中分化出来的。

“费”这个字很古老，甲骨文中作“弗”，“费”作为地名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成书的《左传》和《尚书》。《论语·雍也篇》中有“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的记载。

在《广韵》(中古音)里，“费”有三个读音，表示浪费和姓氏时，都读fei，但表示地方时则读bi。到《资治通鉴》胡三省注释，说当时人已把费县读为fei，胡系宋元之际的学者，可见在宋末元初bi音已失传。此外，据有些学者考证，费作为姓，古代很长时间也读bi，如诸葛亮《出师表》中提到的费伟，应该

读作费(bi)祗(yi)。

山东除了费(fei)县古代叫费(bi)县，还有沂蒙山区的浮(fu)来山也是如此。同样记载“公及晋人盟于浮来”这件事，《左传》叫浮来，《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称作包(bao)来，“浮来”和“包来”并非两个地方，春秋时期的“浮”就读作“包”，两个字那时是相通的。1982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1911年—1992年)在其所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时期全图“齐鲁”部分，标注古浮来地时，写作“浮来(包来)”，将两个名称一块写在一个地点，(包)来人们误认为是两个地方，这也与古代无轻唇音f相关。

地名之外，姓名用字也常常存在多个读音的情况。说到这里，我就想到自己的经历。我自己姓名中的三个字，在普通话中都是平声字，但到了南方，三个字都是古代的人声字。入声字发喉塞音，用力气比较大，所以大学时的老师和同学对我说：你这个名字很难读。这其中，我名字中的“泽”字，在我的学生生涯中，更是出现三种读音：小学是在村子里上的，老家读作“zhei”(阳平)；中学在县城上的，读作“ze”(阳平)；大学在上海上的，读作“zhe”？。这三个读音中，只有ze(阳平)音，是被《新华字典》“承认”的，《新华字典》上也只有这一个读音，“zhei”(阳平)和“zhe”？这两个音在《新华字典》上都没有，有一段时间自己对此还特别困惑。

我祖上是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自山西

洪洞县迁到山东沂蒙山，到我这一代已经在沂蒙山生活了14代，“泽”是我的辈分用字。最初，我以为家乡的译读“zhei”(阳平)是一个古音，但后来接触了南方方言之后，才知道《新华字典》上的“ze”音可能更古老。

我上海的一些同学发入声音“zhe”？很熟练，但发zhe的平声就很困难，那时学校里也有一些广东同学，叫他们学发“zh、ch、sh”这几个卷舌音，他们更难操作。一般认为，南方方言留存了很多古音，比北方方言更古老，而南方人很多发“zh、ch、sh”等卷舌音十分困难，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汉语中的卷舌音是后来产生的——可能是自我进化所致，也可能是受到某种影响。

应该说，每一种语音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有可能经过了漫长的演化历史，也可能是一段特殊历史留下的记号，是一种珍贵的文化符号，但不是所有的“语音活化石”都需要在《新华字典》里标注，这是需要思考的。侥幸留存的“语音活化石”，不会因为央视主持人不读而骤然消失，也不会永远在现实中保持不变，语音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它永远像河水一般向前流淌。

